

執守

反撥

超越

周燕芬 著

七月派史論

執守
反撥
超越



中華書局

周燕芬 著

执守·反拨·超越

七月派史论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执守·反拨·超越：七月派史论/周燕芬著. - 北京：中华书局，2003

(中华文学文库)

ISBN 7-101-03968-5

I. 执… II. 周… III. 文学流派-研究-中国-20世纪 IV. 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55876 号

责任编辑：宁映霞

中华文学文库

执守·反拨·超越

——七月派史论

周燕芬 著

★

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12¹/₄ 印张·287 千字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定价：25.00 元

ISBN 7-101-03968-5/I·504

序

黄曼君

新时期文学研究和理论批评经历了由思辨演绎到分析体验再到多维综合的发展过程,关于以胡风文艺思想为代表的“七月派”的研究似乎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记得是上世纪80年代初,在重提反封建和现实主义回归浪潮中,启蒙主义和现实主义成为审视“七月派”特定的视角;接着80年代中期遇到“方法热”,这个强调“主观战斗精神”的现实主义流派,又在文学主体性讨论的热潮中被研究界热过一阵子。但往后,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外来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传入中国并迅速“热”起来,传统的现实主义似乎已经过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最热门的话题是现代主义:现代主义诸流派(如小说方面的“新感觉派”,诗歌方面的“现代诗派”、“九叶诗派”),现代主义整体思潮(如现代主义诗歌史、诗潮史,现代主义文学史、文学理论),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甚至也被概括到现代主义中去而似乎“刷新”了面貌,提高了“档次”。至于意欲超越时代精神,消解宏大叙事,反本质主义,反理想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则对于与时代和人民血脉相连,洋溢着现实参与激情,宏扬崇高和悲剧审美精神的“七月派”,更是要在“解构”之列,不在“话”下了。正是在这种情势中,“七月派”的研究便相对地趋于冷落。在这一段时间中,包括去年纪念胡

风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关于这一文学群体的研究,大多止于胡风本人的理论贡献和胡风集团的悲剧遭遇上;他们的创作除个别作家(如路翎)受到重视以外,其他作家的诗歌、小说、戏剧和理论批评等门类的作品很少有人提到;而更重要的是,七月派作为中国 20 世纪文学史上最富有流派特征的文学群体,还没有能够从整体上对其外在关系、内部构成和动态发展等方面进行客观、科学、系统的研究和把握。周燕芬的这部在博士论文基础上扩充而成的《执守·反拨·超越——七月派史论》正是弥补了这方面空白的一部很有分量的学术专著。

周燕芬在这部专著的写作中,突破了对于七月派这一文学现象非此即彼、简单否定或简单肯定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格局,摆脱了单纯为七月派的悲剧命运抗争、为它平反昭雪的情绪性感受,也不先入为主地拘泥于某种反封建的启蒙主义或写实的现实主义的切入角度。作者从相关人文学科,如社会政治学、审美心理学、实证历史学、生命创造哲学等多种角度,切入“七月派”这一文学本体的相应领域,展开多维阐释空间:从精神意蕴看,启蒙与救亡,个体与群体,感性与理性;在创作方法上,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审美类型上,悲剧、崇高、苍凉、焦灼,等等,这样,便将“七月派”放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背景下,对这一流派的发生、演变、消隐的动态过程及其成因,以及这一流派在文学理论、诗歌、小说等方面的成就和风格特色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考察研究。正是这样,作者摒弃了那种理念先行映证某种政治观念或学术论点的思辨演绎式的研究方法,吸取了注重思考发现、平等对话的分析体验式研究方法的长处,力求研究方法的开放多元、互补综合,将局部性研究置于全景式整体性研究的框架内,将体验性研究置于体系性研究的视野之中;同时,具持“了解的同情”的精神,注重历史的“在场”

意识,以理性的节制,客观的把握和冷静审视的态度,从而经由现实主体和历史主体的“对话”,赋予研究探讨以学理审视的眼光与科学公允的评价。我想,这符合现代学术的要求,是作者力争学术现代化的努力。

本书作者以学术现代性的要求来审视七月派,而七月派本身,又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中国 20 世纪文学在三、四十年代向现代化纵深发展时期中一个有重大标志性意义的文学现象,具有丰富的现代性内涵。书中没有按照现代性的某些具体观点来阐述七月派的现代性特征,而是从它的全部丰富性和复杂性出发,在它的种种内外部关系和因素中去展示其现代性内涵。从书中可以看出来,七月派的现代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从文学流派的形成及其整体性特征上看,作为现代性精神品格核心的反思性是七月派形成的根本精神动因,也是这个流派的整体性基本特征。自从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以后,反思性获得了真正现代性内涵,人的精神主体对思的反思成为现代化进程中最核心的精神品格。在文学艺术上,则表现为对社会现代性进行反思的审美现代性特征,如对人的精神异化的心灵的诗性救赎,对囿于政治或商业功利主义的艺术平庸堕落的拒绝,对多元歧异的艺术品格多样化的宽容,等等,这些都表现出对现代社会容易出现的同时性的反思和批判。以胡风文艺思想为代表的七月派,则在现代中国的特定情况下,看到了政治意识形态、革命的功利主义所带来的将人的精神价值平均化弊端以及这种弊端在文学上的表现,正如本书所论及的,七月派正是在对抗战文学和五四新文学传统进行深入反思的基础上形成其主要流派特征的。在抗战文学中,特别是在抗战初期文学中,存在着单纯地歌颂光明,表现浮浅的抗战热情的弊端,胡风等人则在对战争的政治反思的基础上进

行了文化反思和精神反思；他们强调继承和发扬新文学的启蒙主义传统，主张将启蒙主义精神灌注到政治救亡中去，他们暴露、批判抗战现实中的政治黑暗与思想黑暗，认为应该看到人民特别是农民身上的“精神奴役的创伤”，重视国民性的改造，坚持民族灵魂的重铸。他们还通过创作思想和方法上的反思，反对客观主义和主观公式主义，提出“主观战斗精神”的核心概念。这些反思成果使得七月派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那些将为政治服务或社会剖析置于首位的文学流派（如“中国诗歌会”、“社会剖析派”）不同，又与那些以艺术和生命为本位的文学流派（如“新感觉派”、“九叶派”）有着明显的区别。正是因为七月派这些立足于文化反思和精神反思基础上的理论与创作上的探索，成为它形成流派特征的主要原因，它的置身于文学主流同时又反拨主流偏向的思潮特点，它在存在形式上既集中又开放的双重特征，它的既体现时代风尚又坚持艺术个体化的风格特色，乃至它的盛衰沉浮的坎坷命运，在 20 世纪的中国都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和开拓性，显示出流派巨大的包容量与影响力。

再则，从流派的思想理论基础来看，七月派的以“主观战斗精神”为核心的文学主体性原则，其独特的现代性内涵，在于它是在主体和客体，情感和思想，感性和理性诸关系中强调的是主体、情感和感性。我们知道，与西方启蒙主义运动密切相关的现代性话语强调人的主体性和理性精神，即人为自己立法，否定超验原则与传统规范，开辟了以人自身的内在性认识外在世界的道路；从社会运行模式上看，则为理性原则的确认，即人按照自身的理性，借助科学精神，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建构起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当然，如上所述，现代性的精神品格的核心是反思性，因此现代性又是通过不断的反思呈多元态势向前发展的。事实上，当现代性

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的偏颇时,人们从现代艺术中找到了拯救人性异化、情感沦丧、意义缺失的潜在能量,这就是审美现代性。这种现代性并非要超越和颠覆现代性,而是质疑于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立足于俗世此岸、当下此在,重视感性生命、直觉灵性、审美自律。它既重视主体性,又从感性原则反对极端理性化的主体性,因此它既是现代性的构成因素和认同力量,又是它的解构因素与异己力量。从本书中可以看到,胡风曾接受别林斯基的“情志说”创作主体论、卢卡契的现实主义真实论的影响,又通过《苦闷的象征》等著作接受过现代生命哲学、人本主义美学和现代主义文学的深刻影响。他正是立足于现代中国、特别是 20 世纪 40 年代的社会实际和文艺实际,融合上述种种影响,提出了以“主观战斗精神”为核心的现实主义理论,从而置身于独特的审美现代性语境之中。论著从作家主体、对象主体以及主客体的关系上充分论述了“活的人”的“感性的活动”“活的心理状态,活的精神斗争”“一代的心理动态”的重要性,论述了作家主体要“自我扩张”,以“人格力量”“拥抱”、“突入”客观,“肉搏”生活,认为这种“主观战斗精神”的核心观点必然要突破现代中国文艺特有的“同一性”——过于理性化、政治化、僵化的现实主义理论的种种禁锢,从而使“胡风的现实主义成为开放的、多元的、本体的,具有艺术调节机制的、更符合艺术创作规律的现实主义,成为具有现代性特征的现实主义”。应该注意的是,作者在论述胡风现实主义的富于原创性和开放性特征的时候,仍然是将它放置在现实主义的总体框架之中的,而且,作者不同意一些论者对胡风的苛求即认为这是胡风现实主义“狭窄”的表现,而是主张将胡风的现实主义放在当时特定的语境下去透视,因为当时若不坚守并开掘现实主义的本真含义,便无从识别和突破已经泛滥多时的僵化的现实主义。这种

态度是实事求是的，也是颇有见地的。

还有一点很能够见出胡风和七月派现代性的独特内涵的，是它们疏离并反抗中心权力话语的话语方式和艺术风格。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国共两党的斗争围绕着建什么国的政权问题进行，因此对峙、冲突极其分明、激烈，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权力话语也日益政治化和中心化。置身于左翼文学阵营的胡风和七月派，虽然他们有着为民族、社会、阶级的解放而战斗并自觉地以文艺服务于政治的现实参与激情，坚持从客观现实出发又以客观现实为归宿的反映论的文艺观念和现实主义精神，也十分重视科学理性和思想理论的作用；但是，他们那一套基于个体感性生命主体的“主观战斗精神”的理论体系和创作实践，与他们那种感性的，显示出生活的生动性与生命的博击力的独特的语言系统，包括文论上的概念、术语、范畴以及创作上的个性化的艺术风格，二者是协调一致的。这里可以看出，语言不仅是工具，语言即是思想本体。胡风与七月派由语言与思想的一致所构成的话语体系是那样独特，它们突兀、惊世骇俗，富于原创性而且具有超越品格：理论上从胡风到阿垅，从吕荧到路翎，他们惯用的概念、范畴如“相生相克”、“血肉追求”、“自我扩张”、“人的花朵”、“拥合”、“突入”、“肉搏”、“原始强力”、“非肉身的空响”等，都是人本性的有着浓烈情感色彩与强烈生命意识的语言表达。作家的创作，诗人如艾青，他注目于苦难，忧郁而激愤的情感，因坚持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又吸纳象征主义和意象派观念和手法，而呈现出的沉郁美和繁复美；其他诗人如胡风、阿垅、绿原、牛汉、冀沅、曾卓、化铁、天蓝、彭燕郊、孙钿、芦甸、邹荻帆、鲁煤等，大多呈现出深情强劲、凄厉狂放的男子汉的血性刚性，表现出沉郁、浓重、悲愤、激昂的独特风格。特别是胡风最为推重、被称为七月派的经典文本的路翎的小说，只要看过他的中

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罗大斗的一生》和长篇小说《财主的儿女们》的人,都会强烈地感受到那“原始强力”的震撼力和冲击力。他笔下的人物,无论是农民还是知识分子,最突出的形象是流浪者、漂泊者的形象,这些形象性格中最突出之点是挣扎、欲望、追求,是灵魂的撕裂或野性的变态;而他们常用的手法除了写实、夸张以外,还有渲染、变形、荒诞和“复调”。这些话语形态与周扬等人提倡文学政治化、大众化、民族化,又理性十足、貌似平正公允的中心权力话语比较起来,显得十分怪异而突兀。于是,他们的话语形态或者被说成是以晦涩的文风表现唯心论的阴暗的思想,或者被目为以咄咄逼人的文风表现出痉挛的近似疯狂的思想,似乎他们的话语成为了“语言的暴力”。然而事实上胡风和七月派只是在很大程度上疏离中心权力话语,表现出对其压制的疏离和反抗,并未从根本上“离经叛道”,用后现代话语理论的术语来说,就是对中心权力话语还有某种“屈从”;而相反,随着与胡风和七月派由讨论而批判,由文艺思想的批判到政治的迫害,中心权力话语“语言暴力”的面貌倒是暴露无遗了。

当然,作者并未完全从上述三个方面来阐述七月派的现代性内涵,而是从它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出发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如认为七月派坚持现实主义是当时的时代要求,也是七月派最为独特之处,不必因为它未提倡现代主义而视其为它的现代性的局限;又如本书作者认为路翎的小说虽然具有现代主义变形的特征,但并不是现代派手法的有意识地导入,而是某种“气质相通”的结果。这些有颇为新颖的见解都是从历史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收到的效果。

还要提到的是,作者在写作博士论文和出版这本书的过程中,学术态度始终都是十分认真的。她不仅注重收集第一手材料,多

次走访于全国,而且注重史论框架对内容的包容性,从而反反复复地进行构思。艰苦睿智地劳作,终于成就了这一部视野开阔、构思严谨、观点新颖、资料丰富的厚重的史论性的学术著作。周燕芬过去是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她的这一部现代文学专著之所以有如此的分量,除了她的努力和正确的治学方法外,还说明中国现当代文学确实是相通的。我以为,把握鲜活的当代精神,从当下复杂多变的文艺思潮中吸取营养,从而使现实和历史的对话既具有历史感,又富有现实感,加以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在广阔的哲学社会思潮和文艺美学思潮中进行多方面审视,使这种研究真正具有学理性和现代性,这正是学术著作富有生命力的重要表现。

2003年5月24日于武昌桂子山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七月派综论	1
一、“文学流派”的界定	1
二、七月派的构成形式与特点	5
三、七月派的发轫、演变和消隐	11
四、七月派与“胡风集团”	26
第二章 七月派的发生	31
一、新文学的路向	31
二、抗战的现实需求	45
三、西风东渐的影响	51
四、生成与存在的必然与偶然	59
第三章 七月派思想理论基础	75
一、胡风的主体性现实主义文艺观	75
二、胡风文艺思想的多元构成	86
三、胡风文艺思想的动态发展	104
四、胡风现实主义理论的独特性	121
五、群体思想理论的交相辉映	134
六、在现实主义的流变中	155
第四章 七月派的流派风格	159
一、体现时代风格:崇高与悲剧的互动	159

二、抒写时代的激情与痛苦	165
三、突出主体的现实主义审美方式	193
四、“七月”式的文学叙述	209
五、流派风格:在纵向演变和横向比较中	247
第五章 七月派作家个性的张扬	255
一、七月诗派的现实主义导向——艾青与田间	256
二、个体诗风的同与异	274
三、天才的小说家——路翎	302
四、现实主义小说的多种新实验	334
五、个体化与文学经典的营构	350
第六章 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	
——七月派的价值和意义	358
附录一 参考文献	368
附录二 胡风与七月派研究部分资料与论文索引	376
后记	394

第一章 七月派综论

一、“文学流派”的界定

“文学流派”是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产物,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作家及其创作自然或自觉地聚合而形成的群体结构,它的出现往往标志着文学活动走到自觉、独立和兴盛、成熟的阶段。鉴于它对文学发展和文学史演变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和意义,“文学流派”也成为文学研究和批评中的一个常用概念范畴。但对这一概念的界定,却因为其内涵和外延的伸缩性,存在着种种不同的看法,其划分和识别与文学诸多因素相关。这里,易于引起理解上的分歧和理论上的争议的相关概念是:艺术风格,文学社团,时代精神,文学思潮,文学体裁,文学题材,同人刊物等。从以上任何一个角度,似乎都可以切入对文学流派的认识,进而成为某一流派之所以成为流派的鲜明标记。于是,流派自身形成中的不同侧重,导致人们对流派概念的不同界定,众说纷纭、不一而足。虽然构成文学流派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并以复合状态呈现出来,但各元素绝不是平分秋色地作用于构成对象。对文学流派而言,基本和必备条件应该有两个,一是相对内在的思想观念,二是相对外在的风格形态。大多数的普及性辞典也涵盖了这两个因素,得出较为简明的定义。如:“在一定历史时期里,思想倾向、审美理想和创作风格相同或相近的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结合而成为文学派别。一般说,需要较成

熟,才被承认。”^① 这一定义以相同或相近的思想倾向和创作风格解释文学流派,因而,虽简洁却也基本成立。

文学思潮是指在某一历史时期的文学发展中有较大影响的、并形成群体性倾向的思想观念及其发展趋势。对于文学流派的产生,思潮起的是直接的作用,并构成流派的内在因素。有学者言:“新文学流派作为文学家群体创造出来的审美结构,文学思潮是其文化环境构成的重要因素,它可以作为‘共振场’源源不断地输送文化信息,作用于文学家们的大脑,刺激其心理组织功能,对各种文学思潮进行选择、分析和综合,然后把信息协调起来加以整合,方可形成文学流派的灵魂和主脑。”^② 此种新颖的“共振说”,确实是切中肯綮之论,使我们进一步明确了思潮与流派之间的同构关系。

无论如何,文学流派是以追求共同性为标志的。思想精神既是共同内核,同时也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流派的外在特征。抽象的流动状的思想精神通过作家主体的创造活动而具象化为审美风格,审美的共同追求落实为相互照应的文学文本,使流派得以实现。日本美学家竹内敏雄曾提出“思潮风格同一说”,认为文学思潮和文学风格“不外是从稍为不同的观点来看同一的客观精神现象”。注目于艺术的形式层面的“样子”时,称之为“风格”,如果只关心其内在根源,把握到的就是“思潮”。^③ 将思潮与风格混为一谈,其理论有很多牵强附会之处,但我们在研究流派与思潮、与风格的关系时,却得到一定的启示,即思潮观念作为内在根源,对流

① 王世德主编:《美学辞典》,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476页。

② 朱德发:《中国新文学流派与文学思潮关系论》,《中外诗歌研究》1999年第3期。

③ 参见卢铁澎:《文学思潮与文学风格》,《外国文学》2000年第2期。

派具有发生学的意义,而审美风格作为外在形态,则是流派形成的显现。倘若视流派为中介,思潮和风格则分别处于前后两端,这多少又可以看到三者之间的复杂联系,从而见出思潮和风格在流派构成中不同寻常的意义。

当然,同构关系并不等于绝对的同一。我们不过是从流派出发,寻求彼此之间的同构因素。显然,思潮大于流派也大于风格,思潮的影响力不只在流派和风格方面;同样,风格也不止于流派,风格是个性化的产物,它首先表现为个体,而聚集为群体化并成熟化的个性,才谓之流派。个性的区域扩展和时段跨越,又会生成民族风格和时代风格,并将流派作为成员纳入其中。在纵横交错的复杂联系中,流派居于自己的特定位置,既是四面八方的作用而生成的独特系统,又会作用于其它系统并属于更大系统的一个分支。任何人为轻视或夸大文学流派作用与地位的态度都非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都是严肃的学术研究所不足取的。

并不是说,有了相同或相近的文学思想和艺术风格,就一定已经构成了文学流派,有些可能是流派形成之前带有普遍性的文学现象,有些也可能是超越流派的文学思潮,但这些都不一定是文学流派。既为流派,就必定有它的组织形式和相应的流派活动,这种外部显性特征往往是人们识别文学流派的关键。虽然组织形式在生成文学流派的公式中是一个变量而非定数,但这个变量却同样是流派存在的必需条件,因为每个文学流派都有自身特殊的生成过程,有些看似并无普遍性的原因,对某一流派来讲或许就是关键的甚至是决定性因素。现代文学史上兴起了许许多多的文学社团,社团未必一定形成流派,但有些社团则直接转化成了文学流派,比如文学研究会和新月社,后来就成为人生派和新月派这两个重要的文学流派。这里,社团就成了必备因素。还有文学刊物,有

些与流派无关,有些则直接是流派的写作阵地,是流派的存在方式,比如《新月》杂志之于新月派,《七月》杂志之于七月派,这里,刊物的作用就至关重要,同样也是流派的必备因素。所谓变量而非定数的意思是,它因流派的组织形式不同而变化,几乎每个文学流派都有一个特定的组织形式,或者称为特定的聚合点,或社团、或刊物、或居住区域、或将帅人物、或选择一贯性的题材、或擅长相同的文体等等,这些都是文学流派研究者断然不可忽略的。

此外,检验是否已经构成一个文学流派,除了上述因素之外,最终取决于流派的整体创作水平与风格的成熟状况,这需要时间和文学接受者的裁定。文学史上对某一流派的认可,意味着对这一群体创作成就的相对肯定,以及对他们艺术风格的赞赏,这种识别与裁定又在文学发展的纵横比较中进行。因此,流派是否成立,不是谁说了就算数不算数的问题,某个作家是否属于某个流派,也不是自己承认和不承认的问题,鉴别流派及其成员,应该有客观的科学认识依据。

综合而言,所谓文学流派,是指持有共同思想观念、创作主张的一批作家,在创作中形成相近的成熟的艺术风格,并以特定的组织形式聚合为与其他作家相区别的文学派别。而且,文学流派比较突出地活跃于某一历史时期,也可以有比较长久的延续性和影响力。

显然,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包揽无余的万能的定义,概括永远只能是挂一漏万的,只能尽量抓住所谓本质和规律性的东西,即所谓基本和必要因素。具体和深入的研究中,则不仅要看到普遍必然性,也要看到特殊偶然性,避免片面和偏执。如论者所言:“在流派的划分上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自然不必过分强调划分流派